

第二次大博弈（上）：（注1）

从苏联塔林到韩国首尔到日本东京，借道基辅，衰落美国超级大国对俄罗斯和中国边境虎视眈眈

作者：Loren Goldner

（注，原文较长，故译文分成两部分发表）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第二次冷战后前几年（注：原文如此，疑作者冷战另有所指），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爆发革命和波兰的团结工联（注2）

风起云涌然后被镇压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东海岸一所高校图书馆工作。我和一位年轻的姑娘共用一个办公室，她刚刚获得斯拉夫语的硕士学位，同时对俄罗斯语、乌

克兰语和波兰语都非常娴熟。然后她突然被美国政府授予一项奖学金，让她立即放下这一切，转而研究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几个月后，她找到一份工作，是与华

盛顿特区的一些“家伙”共事，就突然离开了。一年以后，她倒是来了一封信，说她正在研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媒体以洞察了解其文化。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大约同时，我所在图书馆的研究所所长的一个密友，亨利·基辛格，问我是否可以通过馆间互借的形式，借给他一本关于格鲁吉亚2500年历史的经典著作。当时，基辛格不管哪一天都要收到半打以上的国家元首打来的越洋电话，他看来像那些在里根总统时代逐渐出名的垃圾债券（注3）掮客们一样，头脑聪健。

也许是这些陈年逸事，以及这些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日渐成为报纸的头条，使我开始思考那段1800年到1930年间的历史，就是被称做“大博弈”的时代。这个词，当初是简单地用来指英国和沙皇帝国沿俄罗斯地带（势力范围）的敌对关系的，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用此喻指双方的竞争关系而知名。英国希望保护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免遭俄罗斯人从阿富汗和克什米尔的入侵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q=ALkIrhjURq5h-icHD-kxtBngnTUIXMrYw-ftn1。他们也想捍卫自己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的海上路线。考虑到俄罗斯陆军力量的规模，这一威胁绝非空穴来风。例如，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俄国曾藉此力量占领巴黎，并且在其300年的统治中，沙皇帝

国几乎每天都能吞并数百平方英里，直到它扩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如，在1885年，英军设在印度的一支小特遣队和俄国的一支小特遣队在堪察加半岛附近发生冲突，几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西方股票市场几乎暴跌。

而此前，在1842年，一支17000人的英国军队几乎一枪不发占领了阿富汗，但在随后风起云涌的阿富汗起义中，却全军覆没，最后实际上只有一名士兵得以逃回印度（注4）。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1860年写了一篇关于阿富汗的文章，指出西方强国不应在该地有任何的军事存在。阿富汗一直是博弈中各方最为觊觎的猎物，其原因并非为了攫取阿富汗的一草一木，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平台，足以影响其附近的俄罗斯，印度，中国和伊朗。

随着斯大林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45年后得到巩固，斯大林式的革命也于1949年在中国取得成功，这拉开了西方世界40年的冷战“遏制战略”的大幕。这一时期，沿俄罗斯和中国地域的历史似乎“冻结”了，而且似乎这个19世纪的“大博弈论”也弃之不用了，只有古文物学家才略感兴趣。在俄罗斯和中国境外没有多少人（我怀疑在其国内也是如此）了解或关心关于格鲁吉亚人的情况，还有阿塞拜疆人，奥塞梯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西藏人（注：中国西藏）或维吾尔人。其中许多地区都对西方游客关闭，或是核试验场的所在，或是有着大型的、技术专家统治论式的基础设施项目（注：类似精英统治论）。

诚然，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Andrei Amalrik），曾在他的书《苏联能否存活到1984年？》（1970年出版）中指出，由这些专家团体所带来的“这一全国性的问题”将拖垮苏联；实际上，一些西方观察家如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_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_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q=ALkJrhj_URq5h-icHD-kxtBngnTUIXMrYw-_ftn2（早在1970年代）就曾指出，和土耳其民族的人口爆炸相比，俄罗斯的人口统计呈负增长，其结论与此类似。在西方，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报纸会不时地发表文章，指出1917年之后，在中亚各共和国的妇女从伊斯兰教压迫下得到解放的情况（确实没错）。但当原埃及统治者纳赛尔

（曾关闭过苏伊士运河）在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主义的埃及禁止了苏菲教，并将其珍贵的图书馆手稿当作破铜烂铁扔到人行道上的时候，或是当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将什叶派神职人员清洗到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并鼓励对妇女进行教育时，这些报纸的腔调与以往并无不同。在那些日子里，看起来，似乎只有那些退休的德黑兰的商店主在烦扰着他们的孙子，呆在他们自己的电视机旁不肯离开，并对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共和国革命破口大骂。

我们这些在西方的反斯大林的激进者，曾经希望我们看到的工人们在东柏林的起义（1953年），在波兹南和布达佩斯（1956年），还有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1970年），能成为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先驱。那时，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还没有什么能让我们预见到，在1980年在被占领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波兰工人在琴斯托霍瓦黑圣母像下祈祷。更不能预见到，当时在塔吉克斯坦山区尚未诞生的伊斯兰游击队。

大博弈还有着强大的浪漫气息，始终吸引着一些有争议的人物。众所周知，它是在1904年由英国地理学家麦钦德（H.J. Mackinder）和德国的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瑞典人汉斯（Hans Kjellen）的思想上理论化的。麦钦德拓展了欧亚大陆的概念，引申为“世界岛”，并指出，哪些政治力量能够控制沿俄罗斯地带，就将控制全世界。所谓的“地缘政治”，也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空间”概念的影响，因而是纳粹扩张主义中“生存空间”（注：指纳粹德国的继续生存或经济富足所必需的额外领土）[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_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_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g=ALk\[rhj_URq5h-icHD-kxtBngnTUIXMrYw-ftn4](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_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_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g=ALk[rhj_URq5h-icHD-kxtBngnTUIXMrYw-ftn4)概念的先导。

麦钦德和汉斯的思想，被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接受，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豪斯霍费尔，是德意志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军官，曾在日本留学，是日本把俄罗斯打得一败涂地的日俄战争（1904-1905）的忠实的研究者。（注：日本军队也同样羡慕德国的军事学。）豪斯霍费尔显然能说一口极为出色的日语，韩语和汉语，并据说，他加入了

一个深奥的日本佛教宗派。他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中担任军官。战后，他开始了这一新兴的地缘政治领域（虽然在德国历史中很久远）的学术生涯，并与一个志同道合的叫鲁道夫·赫斯的年轻男子交了朋友。在1923年慕尼黑啤酒酒店暴动失败之后，他访问了在狱中的赫斯，并深深地影响了赫斯的同一牢房的室友，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地缘政治学”作了阐述，豪斯霍费尔也因此名声大噪。但豪斯霍费尔并非纳粹。他因种族问题与纳粹分道扬镳。自从德国于1871年统一后，德国外交部就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支持针对英国和法国的反殖民运动（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承认的1945年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来源）。

这一期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西方的“黄祸论”最为盛行的时候（注：指所谓黄种人对西方人的威胁），日本战败俄罗斯对西方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也是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对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的重要军事胜利。但当纳粹在1933年上台后，希特勒仍倾向于印度由白种人控制（即英国）而非印度独立，无论后者是否可能极大地削弱英帝国的力量。而豪斯霍费尔被边缘化了。他和他的儿子阿尔布雷希（也是一个教授），因涉嫌参与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的阴谋而被逮捕。他的儿子被处死，豪斯霍费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审判，但未定罪。他和他的妻子于1946年自杀身亡。

大博弈在1917年

之后变得更加紧张，当时西方企图在俄罗斯煽动反革命活动，大英帝国站在最前线。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初期，允许很多的非俄罗斯的民族完全独立——即所谓的沙皇

统治下的“监狱国家”。孟尔什维克迅速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更不用提白军了。白军早在俄罗斯内战时就与西方大国共谋，获得大量援助。内战中白军在新独立的

芬兰赢得了胜利，而民粹主义的毕苏斯基（Pilsudski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ftn5%23_ftn5）在新成立的波兰攫取了政权，他还在法国帮助下，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击败红军，成为孤立俄国革命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日本在1918年在西伯利亚东部陈兵7万时，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爆发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危机。

实际上形成的这一包围圈，检测了当时刚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气概，而一些人看到，在1920-1921年间，实际开始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注：列宁语）”（而非

1924年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国家利益胜过其对世界革命的公开支持。在1922年的两年之前的《拉帕洛条约》（注5）使其正式化。德国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战争机器处于瘫痪状态，因而与苏联政府商定，可遣送士兵到乌克兰去参加秘密训练，交换条件是帮助训练苏联红军和安排涉及德国军火商的合同。根据1991年以后可以获取俄罗斯的新档案，曾被派遣到世界各地的德国将军汉斯·冯塞克特（他后来训练过蒋介石的军队）曾在莫斯科发来信息：围绕在托洛茨基（当时的苏联战争外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与德国通力合作。一个月后，秘密会谈开始了，此后不久，列宁也指示他支持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_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_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g=ALkjrjhj URq5h-icHD-kxtBngnTUIXMrYw-ftn8这项活动。1922年签订的《拉帕洛条约》使之官方化。在那些关键的年代，关于德国军队和苏联红军合作的高级别接触细节仍不清楚。但无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注6）把革命复制到德国的意图是多么的真诚，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德国于1923年在汉堡扑灭了德国最后一些起义革命的火焰，有一批军火就是来自苏联的。

在1920年，工人阶级在西方的完全失败，使布尔什维克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和南方，从反殖民浪潮中寻求可能的同盟，而首要的是反抗大英帝国的活动。季诺维也夫在1920年的巴库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注7）上，号召当时占大多数的欢呼着的穆斯林代表们，发起对西方列强的“圣战”。

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时候（那次失败了），原来由沙皇帝国控制的中亚各国就已经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因为中亚国家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在这样的“并非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扰扰的局面中，在2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相结合的理论化倾向，代表人物如苏丹·加里耶夫(Sultan Galiev)（注8）。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结合中亚局势对穆斯林文化给予特别关注。无论他的努力是好是坏，他的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而不能与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相混淆。他最终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主义，并最后消失在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里。http://209.85.143.132/translate_c?hl=zh_cn&ie=UTF-8&oe=UTF-8&langpair=en%7Czh_cn&u=http://home.earthlink.net/%7Elrgoldner/greatgame.html&prev=/language_tools&usg=ALkjrjhj URq5h-icHD-kxtBngnTUIXMrYw-ftn9

沿地图再往西，把革命出口到世界的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和凯末尔领导下创建的现代土耳其。苏联政府与新成立的土

土耳其建立了关系，在1920年确定了一个经济合作协议。但在1921年1月，凯末尔获得了新成立的土耳其共产党完全的领导权。不过这没有妨碍在3月份土耳其和苏联签订商业协定。与此同时，英苏贸易协定签署，苏联城市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被镇压，德国的“三月行动”（注9）被击败，以及俄国开始执行新经济政策，该政策至少表明苏联本身对发生世界性的革命的期望延后了，及该国政策的倒退。

托洛茨基，在1920年他还是战争部长并负责在内战期间组织苏俄军队的时候，写了一个秘密备忘录，提交给列宁和其他高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但这很少被这一期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记录所引述，或出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集里。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它与托洛茨基的革命理论不相符：

“所有来自希瓦城（苏联），在波斯，在布哈拉城和阿富汗的信息，都说明一个事实：在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现时将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困难，直到西方的形势得以巩固，直到我国的工业和运输系统得以提升后，苏联在东方的扩张，相对于与西方发动战争而言，才可能是相对无害的。现时在东方的苏维埃革命，对我们有利，主要是因为可以从外交态势上牵制英国。因此我的结论是：1）在东方，我们应当致力于政治和教育工作，同时应谨慎计算那些要我们提供军事支持的请求，或可能需要提供军事支持的地方；2）我们必须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渠道，以与英格兰就东方形势达成一致。”

这一观念在1920年开花结果了，这就是波斯北部的吉兰共和国。最初苏联政府支持其成为一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但在1920年秋，苏联与德黑兰政府关系改善，苏联相应地建议波斯共产党限制其活动，建议社会主义革命应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吉兰共和国于是在1921年被波斯政府军队粉碎，提供支持的是大英帝国。

在1945年后，如前所述，冷战的实施封存了这段划时代的两极对抗的历史，尤其是在欧洲。

所有这一切都在1979年改变了，当时爆发了伊朗革命（注10），而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决定，要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富汗将来可能的统治者——

以“回报”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注：指美国在越南战争失利）。20年之后，美国开始在欧亚大陆玩大博弈（最初非常成功）。

在1989年后，在苏联帝国在东欧瓦解之后，有些人对Mittleuropa（中欧）这个概念有过一些困扰，他们认为是否要重新起用1945年前德国地缘政治学中这个众所周知的名词。但这个概念随即被美国和北约的新定义替代了，他们沿俄罗斯精确地设定了一条封锁线，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都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美国“针对伊朗”的导弹设施也部署到了波兰和捷克共和国。

贴着美国制造标签的革命“赝品”，即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橙色革命，是同一战略的组成部分。设在基辅的美国大使馆有700名雇员，他们可不全是研究乌克兰民俗的古文物学家（注：反讽，指前文所述的研究大博弈的相关人员）。

继续来看沿俄罗斯地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许不久将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发动战争，作为进一步的战略，其目的就是控制沿俄罗斯和中国范围，同时极其低廉地控制住中东的石油资源。

有些人指出，在中亚地区，中国和印度也在争夺霸权，这可以视为对第二次大博弈假说的驳斥。但如前所述，在这场大博弈中，英国的首要利益是保护印度以及到印度的通道。现在，印度和中国都不再是殖民地，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在下这盘中亚的棋。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只不过通过地区性的核扩散力量，通过提升了赌金，造成了更加多中心点的竞争格局，而已。

译者说明，所有注解均来自维基、互动、百度百科

1.

大博弈：或译作大竞争、大竞力，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8D%9A%E5%BC%88&variant=zh-hans>

2. 团结工联：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创立于格但斯克的造船厂，由列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所领导。在1980年代它组织了波兰国内从天主教徒至反共左翼人士结合为一股强大的反共主义社会运动，并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8%E7%B5%90%E5%B7%A5%E8%81%AF&variant=zh-hans>

从苏联塔林到韩国首尔到日本东京，借道基辅，衰落的超级大国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边境虎视眈眈

作者：LorenGoldner

在9·11事件前，美国因为可以通过其中介，即沙特阿拉伯来支持各种各样的伊斯兰运动，因而可以做出“似是而非的否认”的样子。但其实是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而非其他任何的主流人物，复兴了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他用一种更温和的语言，在他思想体系中占重要位置的《大棋盘》（*注1）一书中，提到了五大欧亚势力：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提到美国需要与其保持平衡和保持其间的平衡。在同一时期，伊斯兰叛乱日益在车臣，新疆（维吾尔族），克什米尔和亚齐发展起来，极大地惹恼了俄罗斯政府，中国政府，印度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美国使用沙特阿拉伯作为中介的目的（无论沙特阿拉伯的目的如何），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挑起伊斯兰革命，只不过是为了刺激这些政府走向歧途而已。但在9·11之后，这一战略，可以说，被重新审视了。但无论情况如何（现在还有人在继续为这些中亚伊斯兰武装提供武器装备），无需太多想象就能了解，美国仍在继续利用这些争端。比如西藏问题，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50年就开始纪录所谓的西藏抵抗事件一样，不断地在打这张“藏独”牌（*注2）。

在后一种情况下，再次，问题不再是“支持”那些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威胁，而仅仅是让他们保持一种平衡，与他们保持平衡或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

而维持欧亚大陆这一世界岛的权力平衡，恰恰正是大博弈始终的焦点所在。

在欧亚大陆另一端，我们看到了美国，加上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在微妙地裁定朝鲜半岛的局势（比如总统布什最近故意虚张声势地在独岛争端上支持韩国）。而台湾永远是另外一张可以打出的牌。

因此，从苏联塔林到韩国首尔到日本东京，这么一系列的完全巧合的事件，就需要那些批判第二次大博弈论的人好好解释一番了。

自1991年俄罗斯开始衰落以来，美国一直在不依不饶地侵扰他们。即便共和党人，前总理理查德·尼克松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谴责这一政策的短视性。当时美国彻头彻尾地支持“民主人士”叶利钦，而西方的资本和顾问全部跑到了前苏联集团那边。克林顿意见的阐述者，戈尔，也完完全全地把这些批评碾为粉末。然后西方的资本就用每个美元（约折合50便士）换来了前苏联的每个便士。同一时期，俄罗斯的黑手党寡头政治者从这一阴影下兴起，攫取了其余的财富。美国的战略，正如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在他的著作《帝国之后：美国秩序的崩溃》（2002）中指出的那样，就是要把俄罗斯重新赶回到他们在17世纪的疆土范围，并阻止其重回世界强国之列。美国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获得北约成员资格而努力，而当一些前斯大林集团重新联合起来，决定他们想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使用那里分一杯羹时

，收取一些利润时，美国和北约又尖声高呼“民主”和“专制”。而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显然不是民主人士。

美国精英知道，他们将会与中国有着中长期的碰撞与冲突，因此，其在亚洲的围堵政策也同样启用了，并且效果良好，即便现在的政策与过去已有不同。

最后，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角度来看“大博弈”。每次当伟大的世界文明（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的生产方式陷入危机时，都是欧亚腹地来改变世界历史的。

公元前1800年，大批印欧人迁徙至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持续了几个世纪。他们侵扰了中东的埃及、巴比伦、亚述、苏美尔和阿卡的定居区，使这些古代近东国家陷入衰落。

公元300-

400年，当原有的古老的生产方式正在接近尾声时，匈奴和其他中亚民族侵入中国、印度和罗马帝国（他们是紧随着那些驻扎在其北部边界的印欧民族之后行动的），再次为结束相应定居区的生产方式做出了贡献。

公元1071年，土耳其的塞琉卡斯人从中亚涌进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在曼济科特打败了拜占庭军队，这成为了后来伊斯兰征服了即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这一事件的转折点。即便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许多支突厥人，如塞琉卡斯人，塞卢喀斯人，奥斯曼人（Seleucids, Sejluks, Osmans）已在14世纪征服了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接着高举着回教的旗帜进入印度次大陆，并在那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公元1250年，蒙古帝国扩展到朝鲜、波兰，借道巴格达，并准备入侵西欧，只是出现了一系列偶然的争斗才使其中途撤退。

只有在16-

17世纪，在整个欧亚大陆的“火药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萨夫费德王朝，明朝(Habsburgs, Romanovs, Ottomans, Savafids, Moghulsand, Ming)出现之后，才挡住这种游牧民族会征服逐步衰落的定居文明的IbnKaldunian提出的辩证法。

因此，中亚人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会历史性地定期爆发，而是在于，当主要文明中心的生产方式处于危机之中时（包括现时，至少，国际力量平衡的主要权力中心，即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都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塑），他们恰恰处在边缘地带。

这五大世界主要权力中心的战略家们也了解这一利害关系，所谓的石油和输油管争端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但那些对第二次大博弈论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却不以为然

。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对上述所提及的证据只是耸耸肩：“很有意思，但政治上却毫不相关”，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可以消灭卫星的武器和有着无人驾驶轰炸机的时代，或者说，美国卷入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当然，第二次大博弈不是对领土的直接控制，就像第一次大博弈那样。

那么，这种关于利益论的分析，是从一个激进的左倾的观点推导出来的吗？是的，它来自于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的长期革命的理论（关于德国），后来由俄罗斯学者瓦斯（Parvus）和托洛茨基发展而成（关于俄罗斯）。

第一次大博弈，如前所述，是英国与俄罗斯角力，时间是1800-1917年（及以后）。俄罗斯则是在世界资本积累上的“薄弱环节”（例如，大量法国资本当时投资在俄罗斯的债券上）。打破这一“薄弱环节”的是俄国革命，其后它被世界范围内革命的失败所孤立，而这种孤立导致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实现”的胜利。

第二次大博弈，时间是1979年至今。从战略上美国已取代英国来控制沿俄罗斯和中国边界，并保证四个欧亚权力中心（欧洲—俄罗斯—印度—中国）之间的平衡，而世界资本积累转移至亚洲，从而避免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跌落。他们也藉此希望会相应地在新的“薄弱环节”，即中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特别是自从尼克松在1971-1973年放弃Bretton Woods体系（*注3）的协议后，美国已经将世界放在一个美元直线攀升的标准中，自1973-1975年和1981-1982年世界经济衰退后，出现类同贫血症一般的“经济复苏”后（相比1945-1973年，从未真正克服过这样的衰退），世界经济一直与美国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相关。

结果是世界央行的储备今年达到7万亿美元。

保持这一泡沫不断增加的热空气，并防止通货紧缩或美元被替代，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几十年来的首要目标，是大博弈在欧亚大陆的最为清晰的重点，也是政治经济学中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不论现在这一“分离器”是否已经被认为名誉扫地）需要从这一设定中掠夺战利品，以避免其本身的崩溃。此前一个重要的范例，相比来说虽然其手段和地理范围更为有限，就是纳粹德国在1933

- 1938年通过沙赫特军用券（*注4）方案作为通货膨胀政策，这种军用券从1938年以后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地理范围。

正如罗莎·卢森堡（*注5）在1913年回应她的批评者时所说，回应那些质疑她论文主题（在她的书中《资本积累》）的必然性的人，那些质疑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为什么要小题大作？为什么要搞这一切？为什么德国军舰开赴所罗门群岛，德国军队奔赴斯威士兰？

同

样地，我（比较温和，仅仅是模仿下不可复制的罗莎）要说：如果没有第二次大博弈，为什么美国和北约要通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从爱沙尼亚到格鲁吉亚到乌克兰一直在搞军事介入？为什么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大的军事行动，并对巴基斯坦形势极度担忧？还可能，有朝一日突袭伊朗？为什么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期冀继续保持其在沿日本，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带的军事存在？

请问，怀疑第二次大博弈论的批评者，这都是为什么？

有些人反对这一论点，指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只不过是在“反恐战争”上进行合作。当然他们在合作！借用一个古老的比喻，大帮会往往会合作以打击那些试图挤进来的小帮会。俄罗斯有车臣问题，中国有维吾尔问题，就像美国有9·11事件一样。美国为在20世纪90年代从波斯尼亚各地到亚齐（印度尼西亚）支持伊斯兰武装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他们是通过沙特阿拉伯作中介的。我们并没有从太多的美国媒体上听到过在波斯尼亚边境作战的伊朗雇佣军，就像以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听到过“民主人士”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的发表的回教徒的观点一样。

一些怀疑者也喜欢认定其原因是中美有长期合作关系。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的确，美国和中国自1950年就一直合作，比如支持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我们也记得，在1971年，这两个国家都支持巴基斯坦总统亚赫亚汗的血腥屠杀（*注6），企图阻止孟加拉国独立，而印度是倾向于苏联的（有100万人在随后的大屠杀丧生）。

冷

战结束后情况有所改变，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拥有核武器，美国也已经修改了其政策，倾向支持印度的核项目。现在的重点是防止在巴基斯坦爆发伊斯兰革命，防范其亲塔利班的军事情报机构，并阻止塔利班（他们还与一些巴基斯坦高官是朋友关系）击败在阿富汗的北约部队，那样就太令人感到羞辱了。而关于这点，美国政府似乎现在做的很好。

美国和中国也很乐意在印度尼西亚问题上进行合作。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在1965年发起苏哈托政变，至少有60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PKI）被杀害时，中国只不过静静地坐回原位，一言不发，什么也不做。此前中国曾建议PKI与其首任总统、民族主义者苏卡诺组建联盟。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成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胜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危急关头控制海上战略咽喉马六甲海峡，而其后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指越南战争）却是失败的。

在1969年美国和中国同样心心相印，当时苏联和中国在黑龙江（外媒均称阿穆尔河

) 附近处于宣战边缘。这种默契不仅为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创造了条件，还让中国慢慢减少了对反击美国的越南战争的支持，并实际上叫停了苏联通过其领土向越南提供援助。

在1978-

1979年美国和中国又站在了同一阵线中。当越南占领了柬埔寨红色高棉，从而引发中国与越南的边界战争时（美国表示支持），苏联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幽灵再次出现。

几年后，在里根总统时期，一些美国官员视察了在黑龙江（阿穆尔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直到1989-

1991年苏联集团解体，美国都一直很高兴地能打出“中国牌”来牵制苏联。

因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呢？一个标志中美友好的合作，还是仅仅大陆间的联盟对抗某些政府和某些运动（那些大帮会所不喜欢的小黑帮）？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活生生的奥威尔的讽刺小说《1984》所记述的那样，三个战争集团鼎立，联盟关系翻云覆雨、转瞬即变的写照。

9月11日可能使我们忘记，在小布什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内，美国与中国就爆发了所谓的中国间谍事件（疑指1999年3月，纽约时报报道来自台湾的科学家李文和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等事件）和臭名昭著的在交付给中国的波音707国家元首专机被安放窃听装置的事件。

我们回想起2003年美国国务院的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会议，其主题就是讨论“中国劳工运动的未来”。很明显，如果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不能达到其前鼓吹的与中国的融合，使之进入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共同体”，美国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支持一个类似波兰“团结工联”型的工人运动来推动这些事情。

总结：在第二次大博弈中，美国在把从爱沙尼亚到韩国的各个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为一种战略，以保持欧亚各权力中心的势力平衡，并保持不断增长的美元免于通货紧缩或被其他货币替代。这个拳击场中央的800磅重的大猩猩，不论是否中国的胡口口或保尔森或奥巴马是否曾经公开提及，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美国必须“骑虎而下”（我很抱歉提及了众多动物园里动物的名称），美国必须面对：中国的崛起，中国拥有2万

亿的美元储备，和大量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贷款金融机构），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开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中。我们希望，要么是协助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形势，以在未来几十年间继续资助美国的无情的经济衰退。要么是，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去发现能够领导一个中国工人运动的波兰瓦尔萨吧，他们会对“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民主表示欢迎。

我们必须希望这些战略都不要失败，而且，与1917-

1921年的俄罗斯不同，全世界工人阶级都不会孤立他们，会与中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

2008年9月

=====

译者说明，所有注解均来自维基、互动、百度百科

英语原文<http://home.earthlink.net/~lrgoldner/greatgame.html>

1: 大棋盘: 布热津斯基曾在1997出版的《大棋盘》(TheGrandChessboard)一书里，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制定了“30年的规划”。他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看到欧亚大陆（从葡萄牙到海参崴）拥有75%的全球能源、75%的世界人口。因此只要控制了欧亚大陆，其他区域则自然归顺。美国必须充分利用后冷战的宝贵时机，使北约组织成为攻坚的桥头堡，让欧洲联盟起着跳板作用，与俄、中、日达成合作关系，及时建立一个“跨欧亚安全系统”，从而使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认为俄罗斯是个毫无前途的“无底洞”，往后既可能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又最好是四分五裂。

2: 指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中央情报局即开始支持“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解密档案还表明，此后其从未停止过对“藏独”势力的支持。可参见：20世纪美国“西藏计划”及其失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21&articleId=7829

3: Bretton

Woods: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

4: Schachtian Mefo-

bill: 米福军用券，金融天才沙赫特的一种异想天开的票据，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

(In 1934, something decisive comes to pass: Schacht meets the lords of German steel. Together they found the Metallforschungsgesellschaft, or MEFO (Research Corporation of the steel industry) – a fictitious corporation with a meager capital endowment (250 000 Marks), against which, from 1934 to 1938, 12 billion Reichsmarks worth of bills of exchange are issued for the first war commissions. The Mefo-bill is the true spark that triggers the process of rearmament.

The Mefo-bill is the bill of Mephisto: it rests upon virtual treasures – upon titles of ownership, which, during the twilight of Weimar, were amassed in the sparse hands of those absentee owners, the new indisputable masters of Germany. 可参见 <http://www.arpejournal.com/ARPEvolume1number1/Preparata.pdf>)

5: 罗莎·卢森堡: 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社会哲学家及革命家。德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资本积累》。可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D%97%E8%8E%8E%C2%B7%E5%8D%A2%E6%A3%AE%E5%A0%A1&variant=zh-cn>

6: 孟加拉屠杀: 1971年3月25日, 巴基斯坦军队发动探照灯任务以消灭东巴基斯坦的人民联盟及其支持者, 目标要“粉碎”孟加拉人的意志。当时在孟加拉的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可参见